
哲学符号学 ● ● ● ● ●

话语符号学：从韩蕾《论巴尔特》谈起

张智庭

摘要：本文从韩蕾博士《论巴尔特：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谈起，首先肯定作者的观点，即巴尔特话语符号学为超语言学并在总体上与其新修辞学有同质关系，同时就“话语符号学”这一概念在法国的出现与当前状况做了介绍，一并以全新的资料厘清了结构符号学、叙述符号学、修辞学及叙述学等相关问题之间的关系，也指明了法国符号学今后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话语符号学，结构符号学，叙述符号学，修辞学，陈述活动

Semiology of Discourse: A Review of Han Lei's *On Roland Barthes*

Zhang Zhiting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reading of Dr. Han Lei's monography *On Roland Barthes: An Exploration of Semiology of Discourse*, in this article the present author completely agrees with her on defining Barthesian semiology of discourse as equal with his translinguistique and la nouvelle rhétorique in general considering the homogeneity among them; meanwhile, this article serves as an introduction of the emergence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semiotics of discourse in French academia; it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tructural semiotics, narrative

semiotics, rhetoric and narratology with recourse to new materials and points ou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semiotics.

Keywords: semiotics of discourse, structural semiotics, narrative semiotics, rhetoric, enunciation

DOI: 10.13760/b.cnki.sam.202002001

一、书名引起的思索

韩蕾博士的这本《论巴尔特：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下称《论巴尔特》）出版于2019年6月，随后，她给我寄来了样书。看到书后，我一方面很高兴，因为我总是乐见年轻人的研究成果问世，另一方面这本书的书名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巴尔特曾经在叙事分析和话语语言学方面做过阐释和努力，但他形成过确定的话语符号学吗？书名中的“考察”二字，是否具有商榷的意味呢？我一时难以获得明确的答案。依据我的认知，在法国的符号学研究中，虽然有列维-斯特劳（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的“叙事分析”、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话语实践”，但形成定见的是，“话语符号学”这一名称及内涵的确立及正式进入法国大学的教学体系，应该是作为法国符号学研究之主流学派的“巴黎符号学派”（École de Paris）的努力成果。这一学派也产生于法国20世纪50年代根据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和其他几位语言学家的理论而形成的结构主义之中。在其创始人格雷马斯（A. J. Greimas, 1917—1992）于1966年出版《结构语义学》（*Sémantique structurale*）之后，这一学派便逐渐与在此之前长时间存在的“sémiologie”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明显地出现了不同，并且该学派参照国际符号学学会采用“semiotics”一词，于70年代初最终采用“sémiotique”来定名自己的符号学研究，以便与“sémiologie”在名称上也区别开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格雷马斯的总体符号学构想就是在参照了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 1902—1976）的相关论述后，依据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A. N. Chomsky, 1928—）“生成语法”的伟大启示而建立起来的：“上个世纪70年代，阿尔吉达·朱利安·格雷马斯主张根据乔姆斯基的语法，将符号学理论的全部构成部分组织成唯一的生成模式；各个层级，从最抽象到最具体，从意指过程的基础结构到表层叙述结构，都做了层递排列。”（Fontanille, 2011, p. 4）这其中自然包括“话语符号学”。可以概括地说，巴黎符号学派的话语符号学就是一套

完整的层级生成系统，具有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组织机制。较长时间以来，人们曾经费劲地在“*sémiologie*”与“*sémiotique*”两个词之间做着区分，其实，我们如果把前者称为“结构论符号学”，把后者称为“叙述论符号学”（也有称为“生成符号学”的），就很容易把两者区分开来。我将在后面介绍这种定名的依据。“叙述论符号学”已经不再考虑符号及其性质和系统，而是专注符号之间的联系：“*sémiotique* 的计划在于建立有关意指系统的总体理论……在巴黎符号学派看来，符号是已经被构建的对象。”（Coquet, 1982, p. 5）随后，格雷马斯便一直致力于构建这种符号学的叙述语法，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才提出了相对清晰的“话语符号学”概念，随后才有了作为雏形的《叙述与话语符号学》（J. Courtés, *Sémiotique narrative et discursive*, 1976）、《符号学赌注（I、II卷）》（A. Hénault, *Les enjeux smiotiques, I et II*, 1979, 1983）、《文本的符号学分析》（Entreverne research team, *Analyse sémiotiques des textes*, 1979）等叙述符号学基础读物的出版，而科凯（亦译高概，Jean-Claude Coquet）的《话语与主体》（*Le discours et son sujet, I et II*, 1984, 1985）则是对于话语符号学中的“主体”和“主体性”的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有了比较全面的话语符号学成果，例如：《话语分析符号学》（J. Courté, *Analyse sémiotique du discours*, 1991）、《话语符号学》（J. Fontanille, *Sémiotique du discours*, 1999）等书籍。这是因为，按照巴黎符号学派最概括的看法，“我们可以将话语概念与符号学过程概念等同看待，并将位于言语活动组合关系轴上的所有符号学现象（关系、单位、操作等）都看作属于有关话语的理论”（Greimas & Courtés, 1979, p. 102）。“叙述论符号学”是在“结构论符号学”之后发展和形成的，它们显然代表着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不同阶段。无可否认，罗兰·巴尔特是“结构论符号学”时期的代表性学者，他的研究成果曾经启发过格雷马斯的探索，但他在巴黎符号学派“话语符号学”建立之初就已去世，那么，他的“话语符号学”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二、《论巴尔特》对“巴尔特话语符号学”地位的确定

我带着不少的问号进入了对于《论巴尔特》的阅读。不想，该书作者在其开篇的导论中也首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是否存在“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是否有理论反思与文本验证？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能否应用于分析典型的话语活动——文化对话？……巴尔特的话语符号

学发展前景怎样?”

作者在导论中引述符号学鼻祖索绪尔在不同版本的著述中对“符号学”(sémiologie)一词的阐述,强调指出索绪尔有关“sémiologie”的定义最初就包含着动态的“符号生命”的意义,并列举了后来的多位符号学名家对索绪尔有关“符号学”概念的诠释,说明了其定义中原本就包含着系统与过程两个方面,其中的过程就是涉及组合关系的。而巴尔特则在这两个方面均有所建树。但是,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是分散的,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这一点上,又可以说巴尔特并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话语符号学”。但是,作者认为,巴尔特在《符号学基础》的引言中“将对于索绪尔语言学与符号学的逆转,及其在《符号学基础》中对于叶姆斯列夫内涵符号学的吸收混合在一起,成功地在索绪尔‘sémiologie’传统下发展出一套既包含索绪尔符号学,也容纳统一后的叶姆斯列夫内涵符号学的新符号学。通过正文的讨论,笔者将会证明,这一套符号学正是他的‘话语符号学’”(韩蕾,2019,p.6)。作者又说,因为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思想分散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的作品中,“他自己也不曾直接地讨论过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存在的‘话语符号学’。从这一观点来看,作者的工作由于是建构性的,因此有很大难度,但是这一工作是必要的,且有其特殊的价值。建构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对我们重新阐释巴尔特在法国符号学史上的定位极为关键,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得以反观其他学者对符号学的建设”。我赞同作者的这一观点,并且随着阅读,我欣喜地看到了作者付出的巨大努力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作者首先告诉我们:巴尔特的符号学及其知识体系都来自一个特殊的话语空间的塑形作用,“是文化,是无数的知识与对话的集合……简单说来,就是互文文本”,于是,作者总结说,巴尔特“是话语符号学思想的读者也是贡献者……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从理论到时间跨越性都更强,他不但活跃于文学研究,也为文化研究、影像媒体研究甚至音乐、戏剧研究提供分析典范”。(p.13)这种情况既为作者对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的重构准备了大量的研究材料,自然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过,作者对于完成她这部书的既定任务还是有足够信心的:她认为“基本能在符号学学科发展承续脉络中定位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的地位,一并探讨巴尔特自己对话语符号学的批判性书写实践”(p.19)。

三、《论巴尔特》对于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重构

全书由四章和一个结论组成。第一章介绍了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思想渊

源与理论基础，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为确立她的论题做了较长时间的系统研究。第二章论述了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对象领域、基本内涵与模式演进，是作者对巴尔特话语符号学重构的核心内容，我们就从这一章谈起。

作者首先从巴尔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Introduction à l'analyse structurale des récits)开始了她的潜心研究，认为这一重要的文章反映的是巴尔特话语符号学初期的容貌。作者认为，巴尔特的叙事分析有结构分析与文本分析之分，并尝试在话语符号学这一更为宽阔的领域内整合二者，将其统一为对叙事话语的意指活动的符号学分析。作者赞同巴尔特的看法，认为每一种叙事作品都是索绪尔意义上的言语，这种叙事在句子之上的范围活动，“属于第二语言学即超语言学的领域。因此，我们研究巴尔特的超语言学(也即我们定义的话语符号学)，他的叙事话语结构分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p. 112)。作者看重巴尔特的这篇《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是因为这篇文章不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巴尔特的叙述学思想，也可以让我们从中提炼出一些在讨论话语符号学思想时必须仔细研究的主题。作者认为，巴尔特在吸收了俄国形式主义者普罗普的“功能说”之后指出，各种功能之间的联系是靠指示词(后来又扩展成了“催化作用”概念)来维系的。这样，功能之间的句段关系就有了与之相配合的聚合关系，功能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分配式的”，而指示词之间的关系是“整合性的”。于是，巴尔特的话语单位结合理论便从索绪尔的组合与联想两轴关系、雅各布森的组合与聚合两轴关系、叶姆斯列夫的关系与关联两轴关系，过渡到了自己的句段与系统两轴关系，从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叙事作品中的结构组成。而这样的结构关系，也指导和培养了读者横向的阅读能力和纵向的对于超功能即超语言学的阅读能力。概括说来，“巴尔特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以‘功能’层、‘行动’层和‘叙述’层展开……他指出了话语符号学视域下对于叙述话语的认知，以及话语符号学所配置的叙事话语的分析方法”(p. 126)，而在这一过程中，巴尔特接受了本维尼斯特的主张，讨论叙述者而非故事人物的声音，尤其是讨论第一人称叙述的问题。作者认为，巴尔特热情地拥抱了本维尼斯特在其《普通语言学问题》中所阐述的原则，说他“全盘接受了本维尼斯特有关人称的分析，尤其是本维尼斯特有关人称与非人称的分类，以及他对人称代词的极性、人称中存在的时位、人通过‘我’在现在时中占为己有而标注自己为主体等问题的分析”(p. 130)。这种认识，也帮助了巴尔特后来在自己的作品中极富创造性地让人称发挥了绝妙的产生全新意指的作用。根据作者的介绍，笔者认为，巴尔特从这个时期开始已经接受了本维尼斯特有关“主

体”和“主观性”(subjectivité)的理论,也接受了作为本维尼斯特对于语言学贡献最大的有关“陈述活动”(énonciation,作者译为“陈述行为”)的论述,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他自己主张的“话语符号学”的内涵与操作手段。

作者认为,正是在本维尼斯特的影响之下,巴尔特在1970年发表的《话语语言学》(Linguistique du discours)中确立了自己的话语符号学的框架,“巴尔特所谓的‘话语语言学’的对象同时包含着话语产物(texte de l'énoncé)与陈述行为,后者是前者的外观。这也是话语分析(l'analyse du discours)、文本语言学(linguistique textuelle)的范围”(p.144)。巴尔特将话语语言学的对象——话语,“界定为言语的有限领域,(该领域)从内容来看是一致的,都是被第二级的交际目的发送并结构化,同时也被语言系统之外的其他因素文明化”(Barthes, p.612)。巴尔特认为,可根据两种必要原则来构建话语语言学:一是话语语言学要明确超语言学而取代语言学的方式:由于话语语言学必然要承担对于语境或情境的研究,所以,它的任务便是为指涉对象编码,而赋予编码的手段则是几个世纪以来同样是在为言语建立编码的修辞学;二是返回语言学,因为话语系统与有关句子的系统一样,也涉及同一层面要素之间的替代(substitution)及分配关系和每一个层次各单位在更高层面的一个单位中的整合。因此,可以不仅把话语看作一种分配关系集合体,而且看作一种被整合的集合体。整合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结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从理论上可以描述意义;其次是总体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赋予系统的界限一种描述性地位。在此,结合作者的论述,笔者想指出两点:

第一,巴尔特明确地说明了话语符号学的对象:一是话语产物,二是陈述行为(或“陈述活动”),这与一般对于这一概念的看法(包括巴黎符号学派)相一致:“我们可以把话语看作陈述语段(énoncé),或者在考虑说话人和谈论情境的人的情况下,将其看作陈述活动(énonciation)”(Rey-debove, 1979, p.49)。第二,巴尔特一直在说,话语符号学属于超语言学,他在这里又告诉我们,在经过超语言学阶段后,还要返回语言学,这就明显地承认,他又调整了自己对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关系的看法,那就是符号学包含着语言学,而不再是相反,亦即实现了第二次“逆转”。《论巴尔特》作者在这里提到了巴尔特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巴黎符号学派使用的“sémiotique du discours”,请注意,其中的“符号学”一词使用的是“sémiotique”(叙述论符号学)。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巴尔特受到了本维尼斯特的影响,或是接受了当时学界对“sémiologie”与“sémiotique”的化约。笔者也注意到了这

种用法，但想在下面的文字中做出更多的阐释。

那么，什么是巴尔特要建立的话语符号学呢？《论巴尔特》的作者告诉我们，“要研究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即超语言学，就必须对其修辞学思想进行深入的了解”（p. 150）。我认为，作者对于巴尔特《旧修辞学》一文的阐释，则是全书最为详细精到的部分。按照巴尔特的主张，旧修辞学为话语分析提供了分析方法，旧修辞学与后来的话语语言学是话语符号学的两个阶段，前者是话语符号学的基础，并为其提供了操作指南，“从旧修辞学中借用的话语分析模式，依然可以沿用于新的话语分析”，超语言学与修辞学具有“同质关系”，因此，“话语修辞学是他用以替代旧修辞学的新修辞学”。（p. 153）巴尔特对旧修辞学的研究开始很早，他在1964年发表的《图像修辞学》（*Rhétorique de l'image*）一文中就说道：“有可能在结构主义视域中研究旧修辞学……因为这一研究将使得它有可能建立一种总体修辞学，即内涵系统之特征的语言学”，这种努力的结果，便是“使得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语言学模式对符号系统的分析，能够包括对于非自然语言在结构上类似的结构/系统的分析”。作者也借助巴尔特这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修辞学主张和巴尔特的批判思想，使我们对这一领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巴尔特在修辞学方面的建树，《符号学词汇》（*Lexique sémiotique*）一书给出的结论是：“在巴尔特看来，修辞学就是内涵要素的形式。”（Rey-debove, 1979, p. 125）这似乎可以帮助我们对巴尔特的修辞学理论做进一步的理解。

书的第三章《自我反射式的书写对话语符号学的实践反思》，是分析了《巴尔特自述》和《恋人絮语》（作者使用的译名是《爱的言谈——片段集》）两书中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展现；其第四章是《作为方法论的话语符号学对比较文学的模构：案例分析》。这两章都展现了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在“陈述语段”（或作者使用的“陈述结果”）亦即在“形态研究”方面的成果。这些对于我们都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并进一步印证了作者对于巴尔特话语符号学重构的成立。

似乎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话来概括作者为巴尔特总结出的话语符号学：话语符号学就是超语言学研究，这种研究有层次衔接，它从总体上讲与修辞学具有“同质关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部书并不是在汇总性地介绍巴尔特已经存在的话语符号学思想，而是从其多个方面的符号学论述中总结和概括出属于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理论构架和内容。这自然是一项艰巨和富有意义的工作。而且，由于巴黎符号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很快就成

了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在至今的长时间内，人们甚至基本不再谈论“结构论符号学”的贡献，也不谈巴尔特，那么在这个时候，系统地研究“结构论符号学”的代表学者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就更显示出其特殊的意义。

四、对几个相关问题的浅见

我们当然是围绕着罗兰·巴尔特和他的符号学活动来谈。

(1) 关于“sémiologie”与“sémiotique”的译名。我曾根据《结构主义史》(*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 1992)一书对“sémiologie”内涵的阐释和主张，将其在汉语上定名为“结构论符号学”，放进了我编写的长文《法国符号学概论》中，该文后来被收进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符号学研究论集》一书。当时这样定名，我就遇到了在汉语中如何定名“sémiotique”一词的问题，可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我最后还是采用了“巴黎符号学派符号学”的名称。后来我想到，这种符号学以“叙述语法”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便觉得似乎为其定名为“叙述论符号学”比较合适，以方便区分和记忆，但这要找到相关论述作依据。不久，我又想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两个名词是经常互用的，比如，格雷马斯在1973年发表的文章《一个叙述符号学问题：价值对象》(Un problème de sémiologie narrative: les objet de valeurs)照样使用了“sémiologie”作为“符号学”的名称，但这同一篇文章在被收进其《论意义II》(*Du sens, II*, 1983)时，就将“sémiologie”改为了“sémiotique”。这不，这里已经出现了“sémiotique narrative”的称谓，这就更强化了我的想法。前不久，我在我过去的一位学生为我提供的一篇参考文章中也找到了支持。那是格雷马斯的祖籍国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大学的尼乔勒·盖尔斯伊特(Nijolė Keršytė)先生用法文写的《话语的相互作用：在叙述论符号学与叙述学之间》(Les interactions discursives: entre sémiotique narrative et narratologie)，那是发表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协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2008年第5期，第85-104页)。所以，我认为，把两个名称分别定为“结构论符号学”和“叙述论符号学”是符合各自内涵的——尽管后者在本质上也是“结构论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有了上述认识之后，2017年5月30日至6月2日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举办的“今天的格雷马斯：结构的未来——纪念格雷马斯100周年诞辰(1917—1992)”的国际研讨会的宣传材料中，巴黎符号学派也承认在现时的“sémiotique”研究中，仍然有“sémiologie”的研究内容，并且该学派也以名

词加形容词的“结构论符号学”(sémiotique structurale)自居,只是其中的名词是“sémiotique”,而不是“sémiologie”,并称今天的巴黎符号学派是对当年结构主义的真正继承。在认真思考之后,我认为,这是法国符号学研究不同学派在几十年的纷争之后于认识上的一种趋同。这样一来,自然就需要把我认定的两个名称做一下变动。我的想法是,在汉语上将“sémiologie”称为“结构符号学”,将“sémiotique”称为“叙述符号学”,它们都去掉一个“论”字,而在这两个名称之上人为地设立一个统一的上位词——“结构论符号学”,这就不会再引起理解上的困扰了。而相对于法国符号学今后的发展,“结构论符号学”正包含着两种有着一定差异的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大的阶段。至于法国符号学今后的名称,我在我的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法国符号学将会是在统一的“sémiotique”名下,对符号、符号性质、符号系统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亦即“词语显现”的一种总体研究,就像我们在汉语中对于“符号学”这一学科的理解那样。

(2) 巴尔特在文章《话语语言学》中,于结尾之前采用的都是“sémiotique”这个词。我认为,巴尔特在此可不是混用两个名称。一位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于法国高等研究院(EHESS)聆听过巴尔特和格雷马斯讲课、现在从事法国符号学史研究的美国学者托马·布罗登(Thomas Broden)在纪念格雷马斯100周年诞辰研讨会上,以《结构主义的另一条道路:格雷马斯与巴尔特的合作》(Une autre voie du structuralisme: la collaboration Greimas-Barthes)为题做了发言,谈及两个人过去30年中有过的三次密切合作:第一次是在1950—1955年期间,格雷马斯曾劝说巴尔特与他一起进行词汇学研究,并注册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由于巴尔特忙于写作和解决生计问题而未能继续下去;第二次是在1955—1968年期间,两人针对雅各布森与列维-斯特劳斯对于波德莱尔诗歌《猫》(Les chats)进行形式主义分析,决定共同却各自地致力于对话语结构的意指和社会功能的研究,但在后期两位学者出现了较大分歧;第三个阶段则是在1968年之后,两个人又都表示出在研究方面相互靠拢的意愿(Broden, pp. 214 - 227)。巴尔特的《话语语言学》一文正好发表在这个时期中的1970年;而格雷马斯也在此期间与之相向而行,并在由他和库尔特斯合编的《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中于词条“sémiologie”名称下肯定了几位先行者做出的努力,也赞许了巴尔特的著述,例如《符号学基础》和《服饰系统》(Système de la mode)做出的成绩与贡献,还在巴尔特去世后写出了几篇在思考方式上并不是特别严格的属于审美方面的文章,以《不完善性》(De l'imperfection, 1987)为名

出版,算是两个人在思想上和研究方法接近的表示和对两人友情的纪念。(Broden, pp. 214 - 227) 更何况,1969年在巴黎成立的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名称采用的是“sémiotique”。这也再一次证明,巴尔特是善于学习别人和随时修正自己观点的谦虚学者。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在最后还是使用了“sémiologie”的形容词形式“sémiologique”。我的解释是,巴尔特认为,话语符号学也还是离不开结构符号学,因为他在论述其总体作用之后就说,这种作用“同时以结构符号学的(sémiologique)术语(这一点很重要)来定名该系统与社会和历史衔接的时刻:一种尊重整合性原则的叙述符号学具备有效地与一些外在结构符号学例如历史学、心理学或美学进行合作的任何机会”(Barthes, p. 616)。这里,显然涉及原本属于“sémiologie”符号学研究的一些内容。巴尔特没有说错,笔者在2016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于法国做短期学术访问期间,曾有幸与当时的法国符号学学会会长德尼·贝特朗(Denis Bertrand)教授会面,他当时让我看了他与名誉会长雅克·丰塔尼耶(Jacques Fontanille)一起为纪念格雷马斯100周年诞辰而起草的国际研讨会资料,标题是《今天的格雷马斯:结构的未来》(Greimas aujourd'hui: l'avenir de structure)。这份材料把格雷马斯的研究仍然归为结构主义运动,并对其贡献做出了评价,指出,“格雷马斯……在其对于意指的分析中以最为稳定的方式展示了结构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他的研究工作在于以这位学者特有的纯真来过问意义的出现和塑造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材料中提出了研讨会的思想讨论主题:一是“一项在时间延续中的科学计划:继承、后续和转换”,主要探讨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项科学计划的结构主义的后续研究工作并对其做出评价。笔者惊异地看到,该材料对于所涉及的单独学科的符号学仍然使用了“sémiologie”一词,这说明现在以“sémiotique”来命名自己符号学研究方法的巴黎符号学派已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尽力使自己与前者分开,而是也接受、继承了前者。我当时只有两个月居留签证,无法参加于当年5月30日—6月2日的研讨会,便请当时还在那里学习的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李双老师为我拿到了会上发言的摘要汇编本。有关这次研讨会的情况,大家可参阅李双老师在《语言与符号》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

(3)《论巴尔特》的作者把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最后内容放在了巴尔特研究过的修辞学方面,是值得称赞的,因为这正与法国符号学的发展远景相一致。我们都熟悉热奈特对修辞学研究做的贡献,他曾把巴尔特为阐述“二级符号”所绘制的层级式图表直接用来阐释修辞格与总体的修辞学。他说:“有关修辞格的修辞学的雄心,就是建立文学内涵的一种规则。”(Genette,

p. 220) 他后来进行的叙事话语的研究,也是与修辞学紧密关联的。可以说,热奈特为之奋斗的诗学(包括叙述学[narratologie])就是对修辞学的延展和深化。在此,我想就叙述学与符号学的关系,说一说几十年后人们的观点。上述美国学者托马·布罗登2019年于法国符号学两年一次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他对20世纪60年代的叙述理论研究的成果,他把“叙述学”与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放在了一起,作为那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符号学的两种叙述理论研究,这获得了与会学者们的赞同。这种情况,有益于我们国内学者调整看法,原因是,热奈特与托多罗夫曾经说过,叙述学是对于话语文本“词语显现”(manifestation verbale)的研究,它不属于具备语言学背景的“sémiologie”和与语言学不分的“sémiotique”,而这样的表述一旦翻译成汉语,就成了“叙述学不属于符号学”,因此,也就造成了我们国内学界理解上的某种偏移。

后来在修辞学上做出深入研究和重大贡献的学者,当属上面提到的德尼·贝特朗先生。贝特朗认为,修辞学早已突破了其作为对于语言的文学使用的定义,有关修辞学的符号学研究的革新自21世纪初已经开始,并成为符号学学科研究的重要事件。在文学符号学领域,这种革新的首要成绩似乎是使修辞学摆脱了文体学(stylistique)并将其放在更为宽泛的维度中进行重新考虑。问题的关键已不再仅限于修辞格的使用和“文体效果”的显示,而是关于处在行动中的言语活动的包括说服性和操纵性在内的可分享的效能(efficience)。现在,人们应该将话语的修辞学空间放进有关长时值的大的符号学研究工程之中来重新定义,“在我看来,符号学的最宏伟计划之一,将是被设想为对于修辞学的一种当然的替换”(张智庭,2019,p.226),即是说,未来的修辞学就等同于符号学。这种放大修辞学的研究领域和其与风格(style)相脱离的理论主张,无疑是需要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的。我们在肯定巴尔特具有远见卓识的同时,也不禁为《论巴尔特》一书的作者认可巴尔特的那种观点拍手叫好。

结束语

我向韩蕾博士送上诚挚的祝贺,她的研究成果让人们更为深入地了解法国符号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学者巴尔特。如果要我提一点意见的话,那就是在术语的使用上,最好多采用现在比较一致的译名;此外,巴尔特在对“阅读”和“听”等属于“陈述语段”方面的论述,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认知作用,亦可在这方面再着一点笔墨;再就是,书名中的“一个话语符号学”中

□ 符号与传媒 (21)

的“一个”可以考虑改动一下，因为这样的量词似乎不适合用在“符号学”这种概念名词前面。总之，《论巴尔特》是一部研究巴尔特的重要著作，我希望有更多研究巴尔特的著作问世。

引用文献：

韩蕾 (2019). 论巴尔特：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张智庭 (2019). 法国符号学研究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Barthes, R. (2002).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III*. Paris: Seuil

Brodin, T.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afsemio.fr/wp-content/uploads/AFS_Actes.2017.pdf, 214 - 227.

Coquet, J. - C. (1982). *L'École de Paris*. Paris: Classique Hachette.

Fontanille, J. (2011). *Corps et sens*. Paris: PUF.

Genette, G. (1972). *Figures III*. Paris: Seuil.

Greimas, A. J., Courtés, J. (1979).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Paris: Hachette Supérieur.

Rey-debove, J. (1979). *Lexique sémiotique*. Paris: PUF.

作者简介：

张智庭，笔名怀宇，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法国符号学译者和研究者。

Author:

Zhang Zhiting, professor from the Department of French,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a full-time researcher of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Semiotics, and a translator and scholar on French semiotics; some of his works were published under the pen name of Huaiyu (怀宇).

Email: zhangshuono3@163.com